

## Z 专题深思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0周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定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如何将其具体落实,还需要超越传统观念,在“四个共同”的指导下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起同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实际相符的话语体系。

## 从“国家”视角定位中华民族共同体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核心概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从“四个共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多民族国家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性质。这一思想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理念的完善结果作出了如下总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包括我国今天的56个民族,也包括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族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实体,各民族居于从属地位。”

当今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中,主权国家是常态,国民共同体是主权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石。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同步共生、互为因果,从“国家”的视角定位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合中国的实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

## “四个共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

如何认识和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四个共同”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创新性认识,更是在超越传统认识基础上的高度理论概括和思想指导。

“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是对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创新性认识,超越了传统的历代王朝史观。如果说《汉书·地理志》开“中国正史”记载历代王朝疆域沿革之先河,那么1938年出版的顾颉刚和史念海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则是今人从历代王朝视角阐述多民族国家疆域历史的先行者。而尽管白寿彝在1951年5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提出“历代王朝的疆域”不能代表“中国疆域”引发了持续至今的讨论,且以当今960万平方公里领土为基础“上溯”的做法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历代王朝史观对国人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其他更多政权在其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客观肯定。“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观点的提出有助于超越传统说法,客观定位中华大地上所有族群和政权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建立更加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实际的话语体系。

“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超越了传统的王朝历史叙述方式,是对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创新性认识。因为以《史记》为开端的“二十四史”的存在,将历代王朝历史称为“中国”,其历史等同于中国历史,或将历代王朝视为汉族王朝来认识中国历史曾经是国人的传统做法。这种做法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有所改变,但以历代王朝历史为主体认识和诠释中国历史还是常态。历史事实是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的众多人群在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同时,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也在密切着相互之间的“血肉”关系,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自强”的发展过程,多民族国家疆域和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观点的提出,有助于超越传统历史观,客观认识和诠释中华大地上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超越了传统的单一文化观,是对多彩的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认识。“凡居中国,必因天地寒暖燥湿风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这即是《礼记·王制》对多彩的中华文化的记述,同时也是传统划分人群的标准和方式。出于争夺“中国正统”的需要,“中国”“中华”是“大一统”的重要标识,而随着“华夷之辨”不断得到强化,主张“大一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主流,并在近代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和汉族实现了对接,成为传统文化观的主要内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观点的提出,有助于客观认识和诠释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更有助于准确理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深刻理解「四个共同」

□ 李大龙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超越了传统民族认识,是从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视角对“民族精神”的创新性认识。“民族”一词源自“nation”,并非中国古籍固有词汇,近代传入中国后和中国传统人群划分方式实现了嫁接,将古籍中出现的冠之以政权名称的如“匈奴人”视为“匈奴族”等是常见做法,且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而被赋予特殊含义,其后则以“minzu”样貌再次出现在英语世界。“伟大的民族精神”是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众多人群在缔造多民族国家并凝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过程中形成的智慧结晶,是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的,“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观点的提出,有助于客观认识和诠释“伟大的民族精神”。

“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目的;而在“四个共同”指导下构建正确的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具体抓手。

## 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超越传统的全新视角

以“四个共同”为指导,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更需要从“天下”这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家园”的视角来认识和诠释中华大地上众多人群经过交往交流交融而凝聚为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

当今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共同缔造的,其中“大一统”历史传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先秦典籍中“天下国家”则是对“大一统”的最早表述。《孟子·离娄章句上》载: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史记·封禅书》载:“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概念虽然内涵丰富,但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无论是从王朝政权,还是人群分布,抑或是文化等不同视角,“中国”都不是指称“大一统”王朝国家疆域的概念,指称王朝国家疆域的概念是“天下”,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在多数情况下适用的场景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对“正统”乃至“大一统”的博弈,所谓的“正史”记录的记述即是胜出者的历史。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和沙皇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有“将属于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俄罗斯”的条款,此是“中国”具有指称多民族国家含义的最早记载。以此为标志,“中国”不仅成为清朝多民族国家的代名词,而且也具有了指称清朝主权国家疆域的属性,在政治地理空间上“中国”和“天下”实现了重合,多民族国家疆域从传统“天下国家”时期的“有疆无界”实现了向主权国家“有疆有界”的转变。从这一新的视角审视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历代王朝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其并不等同于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全部,非历代王朝的作用也不能否认,二者合在一起才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全部。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的众多人群随着历代王朝和非历代王朝的形成与发展而被凝聚为不同的群体,最终随着清朝“大一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而“自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相加,而是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而凝聚为一体的血肉联系。

以“天下”视角构建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才能做到对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共同”理论的完美支撑,也有助于“四个与共”共同体意识的实现和巩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编著)

##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加快改革产业政策实施方式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 刘志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新型的政策体系,是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与举措之一,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各地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遵循“因地制宜”这一原则,切忌不切实际、一拥而上地推进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一,产业政策的支持位置前移,重点支持处于产业链前端的科技创新环节,以此巩固和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就。**《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指出,“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一些地方政府主导实施的产业政策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能够做到因地制宜。往往是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号召发展某个新兴产业,一些基层官员不经过科学研判、统筹规划,就把资源全都指向这个产业,随后企业家全力跟进,金融机构也会全力以赴给予贷款。而以上做法就可能与新发展理念、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容易造成资源过度集中与产能过剩。因此,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下,产业政策要与时俱进,把支持的重点放在产业创新链上,而不是将更多的资源放在生产环节,即产业政策要支持科技创新的突破,而不是简单的产能复制。具体来说,产业政策要帮助行业克服关键环节的“卡脖子”技术问题,而不是帮助特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当新兴领域的技术完成了突破,相关企业获得了定期垄断的专利权、已经可以正常生产了,产业政策就要及时退出,不能无限制地补贴;金融机构也不能拿着政府的产业政策目录去发放贷款,而是要算经济账。这样,一方面可以适度地集中创新的资源,以更大的几率获得创新环节的突破;另一方面也能极大地降低产能过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发展效率与质量。

**第二,增强统一大市场条件下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中央不断地向地方下放事权,有些财力雄厚的地方政府往往

把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产业政策作为参与区域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在各种以产业政策名义主导的地区间竞争中,有些地方通过各种明补或暗补的方式,拼抢价高税大的重大项目,拼比优惠政策力度,形成不公平竞争和市场壁垒;“一窝蜂”地追求本地没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以保护本地企业的名义,限制外地企业竞争,或者以行政权力干预地方司法为本地企业谋取利益。显然,这种具有明显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特征的行政区经济现象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成长。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将为尽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为此,应让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站到前台来。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应该集中于少数关键的、最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运用新型举国体制建设具有强烈网络外部性特征的新型基础设施,如一体化算力体系、突破少数“卡脖子”的技术瓶颈环节等,彻底疏通产业链、国内外市场间的循环,尽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第三,全面强化产业链,以此支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进步的最终动力来源于多元经营主体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性,来源于它们之间的竞争活动,因此为了鼓励竞争,必须竞争化地使用产业政策,例如,用其去扶持某条产业链上某个潜在或在位的相对弱小的竞争者,以形成与链上垄断势力强大的在位者之间的对抗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产业政策也是一种具有更加积极进取意义的、可以促进发展的竞争政策。

目前国内一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平台型企业,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渗透为依托,正在摧毁旧的产业体系中的各种市场壁垒,推动形成以新技术为主导的市场结构,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革命性意义。一方面,要看到并预防这种平台经济对市场的垄断性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运用新的竞争政策加强对其规制管理;另一方面,也要运用产业政策支持更多的科技平台企业进入,通过平台企业之间的充分激烈的竞争,发挥其在打破现有的市场分割与政府保护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以强化产业链的竞争力为导向建设现代化产业链,这时的产业政策也就变成了有助于提升效

率的竞争政策,政策综合运用的实际效果可能会好很多。

产业政策指向“强化产业链尤其是其韧性与安全”,不仅可以创造产业链现代化的竞争环境,而且有利于在技术快速发展变化的条件下,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反垄断标准,促进现代产业的科技进步。在技术快速发展变化条件下,有无潜在进入者的原则,是动态反垄断标准的主要原则。其实,这个原则代表的更高技术水平的潜在进入者与现有的主导厂商之间的横向竞争,考虑了全球市场中的潜在进入者和替代品的动态竞争标准。在我国反垄断政策实践中,贯彻这个原则可以遏制垄断趋势,更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具有新质生产力特征的创新企业。

**第四,产业政策支持的对象转向主要补贴需求方的用户或消费者,以市场需求拉动技术创新。**研究表明,当一个产业处于初期时,政府可以直接对投资行为进行补贴,以促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当该产业发展至成熟阶段,产能可能出现过剩时,政府应减少甚至取消对投资者的直接补贴,而提高研发补贴比例,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增加有效供给;与此同时,可以加大对消费者的补贴力度,以便在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基础上扩大新兴市场产品需求。计量经济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产能过剩具有正向推动作用,政府补贴占企业总资产比例每增加1%,企业产能过剩水平上升约0.958%。当前,我国产业政策的扶持方式,除了需要进行公开化、透明化改革外,主要是可以从对生产者这一方的补贴,转化为对使用者、消费者或用户这一方的补贴。这种补贴方向的改变,一方面可以刺激新兴产业的市场规模扩大,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生产者竞争消费者的过程中,遴选出消费者心目中真正优秀的企业,同时也有利于铲除这方面的腐败土壤。另外,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与金融强国相匹配的高质量资本市场的今天,还可以考虑通过强化“科创板”的功能,让真正的高科技企业上市发行股票,以体现产业政策对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主体——风险型科技企业的特殊支持。这种政策支持因为有市场作为支撑,不仅激励力度大,而且符合国际通行规范。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

表的部分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导致他们对中国采取经济打压、政治围堵和思想抹黑等措施。中国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解决经济发展和技术上的“卡脖子”问题,还必须应对政治上的战略主动和观念上的话语权问题。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现代化进程重要标志。尽管西方民主历史较长,但由于生产关系、政治传统和价值观的局限性,其民主实践主要集中于定期选举、党派竞争和话语权争夺。这种模式往往使民主变得乏力,成为人民在各种口号诱惑下参与投票后只能静观党派争斗的“跛脚民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总结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要理念,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新篇章。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人民民主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价值引领上,确立了人民至上、保障人权、公平正义、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核心理念;制度安排上,构建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权利行使上,建立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运行体系;权力规范上,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和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机制,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权力为民所用。

与西方自由民主相比,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关注和保障选举中的平等权利,更注重在整个国家治理过程中体现和实现人民主权,追求广泛的人民参与、全面的权利保障、有效的权力监督和系统的制度安排,以确保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部分,全过程人民民主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使中国式现代化在民主政治层面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悖论,并以其显著成效为世界特别是后发型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也为我国在与西方制度竞争中打破西方制度霸权和话语优势、赢得战略主动、促进国家政治稳定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参政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统战理论与政策教研室主任)

## 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价值

□ 黄天柱

## ▶▶▶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纵观世界近现代发展史,现代化与民主总是相伴相生。现代化为民主提供物质和精神基础,民主是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核心内容之一。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往往直接影响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和实现程度。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必须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100多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探索适应超大型国家治理和发展需求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在这种民主形态下,既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又要确保国家有效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理念,这也是在中华民族复兴和世界格局调整深度交汇的历史时点上,中国共产党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的重要内容,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这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维度勾画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民主图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把“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列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和目标之一,就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等改革任务。这些部署和举措对于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整体上彰显和发挥中国民主制度优势,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 “两个结合”的重要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制度化安排,确保人民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环节的广泛参与,使民主不再只是选举和投票的代名词,而是贯穿于整个国家治理过程的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和国家学说实现“两个结合”创立的全新民主形态,具有先进的政治理念、鲜明的中国特色、深厚的文化底蕴。

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和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包括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确立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以民主集中制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机关、公民享有平等和参政的权利等,创造性运用于人民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实践,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人民民主而持续努力。相继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争得人民民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构人民民主”、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人民民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化人民民主”,并最终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原创性概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和国家学说的创新与发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底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 ▶▶▶ 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触动了以美国为代